

• 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丛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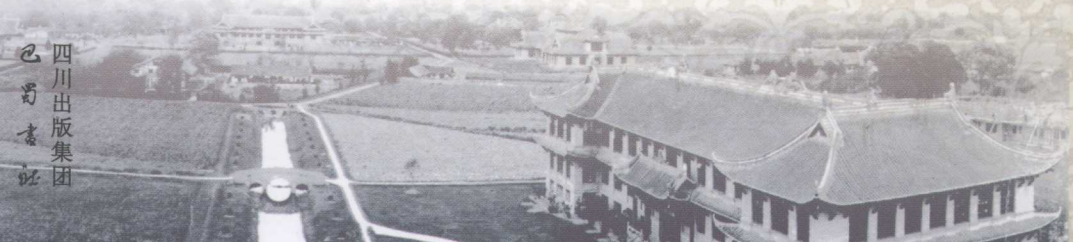
中西合治 华西协合大学

马临书



张丽萍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014035472

● 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丛书 ●

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项目
四川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项目
2008年度四川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精品培育项目

G649.287.11
04

中西合治 华西协合大学

马瑞利



张丽萍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北航

C1722845

G649.287.11

0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西合冶: 华西协合大学/张丽萍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13. 10

(国家“985 工程”四川大学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丛书/卿
希泰主编)

ISBN 978-7-5531-0286-3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华西协合大学—研究
IV. ①G649. 287. 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2876 号

中西合冶: 华西协合大学

张丽萍 著

ZHONGXIHEYE HUAXI XIEHE DAXUE

责任编辑 王 雷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 bsbook. com](http://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28) 86106170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21. 125

字 数 5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31-0286-3

定 价 6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
哲学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丛书

学术委员会

名誉主席：蜂屋邦夫（日本）

主 席：卿希泰

委 员：（以姓氏笔画排列）：

王 卡 任 远（加拿大） 朱越利 李 刚

余孝恒 张泽洪 张松辉 陈建明 陈耀庭

柏 夷（美国） 郭 武 唐大潮 卿希泰

盖建民 詹石窗 蜂屋邦夫（日本） 黎志添（中国香港）

潘显一

编辑委员会

主 编：卿希泰

副主编：盖建民 李 刚 詹石窗 潘显一

委 员：（以姓氏笔画排列）：

李 刚 陈建明 周 冶 林 建 郭 武

唐大潮 卿希泰 盖建民 詹石窗 潘显一

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哲学 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丛书总序

卿希泰

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在这个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国家“985工程”开始启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几所名校率先获得国家较大力度的支持；紧接着，教育部又与有关部委、省市签订协议，对部分基础好、水平高的高等学校进行共建，予以重点支持。这个“工程”的实施，是党中央在世纪之交，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落实科教兴国战略、迎接知识经济挑战而采取的重大决策，是从根本上提高我国高等学校办学水平的重大举措。经过几年的建设，“985工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不但有力地推动了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大大提高了社会服务工作水平，而且缩小了我国高等学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当然，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它需要

较长时间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不仅需要长期形成的优良学风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而且需要有强大的经费投入作为支持。有鉴于此，国家于2004年6月又开始启动了“985工程”二期的建设工作。“985工程”二期的建设，是国家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运用创新思路寻求高校持续性、跨越式发展的重大举措，其基本思路是：集中资源，突出重点，体现特色，发挥优势，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平台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促进一批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使之成为攀登世界科技高峰、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带动相应学科领域发展的重要基地，使高等学校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同时，引进和造就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和创新团队，加快建设一支具有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的教师队伍、管理队伍和技术支撑队伍。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国家教育部、财政部决定集中经费对一些高校的名牌学科进行重点扶持，使之成为汇聚人才、持续创新的“平台”或“基地”，以加快这些学科的成长步伐。

在“985工程”的建设工作中，国家尤其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早在2003年教育部就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发展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2004年中共中央又颁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与此同时，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一定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2004年6月，教育部部长周济同志在“985工程”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当前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性机遇，全面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全面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使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思想库”“人才库”的作用。同时，周济同志还指出：我们应当推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的

交叉、渗透与融合，孕育和催生新的学科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形成一批能够解决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论及现实问题，为党和政府决策咨询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的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基地。“985工程”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设立的，其特点在于跨学科并具有开放性，能够围绕国家、区域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而组织主攻方向并进行联合攻关。

在“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建设中，国家提出了建立“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经过评审，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有幸成为承担“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建设任务的主干机构。在此基础上，还整合了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和藏学研究所两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及专门史、中国古典文献学两个“国家级重点学科”中与宗教学有关的科研力量，并向海内外公开招聘高级研究人员来参加建设，共同开展研究工作，以达到集合海内外本专业的学术精英和优势科研资源，突破个人分散研究的有限视野，将个人的学术专长进行整合，从而形成一个具有综合创新能力的研究集体，故这个基地实际上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研究平台。

在建设“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时，我们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国家这一国情出发，结合我国宗教学学科建设的要求，初步确定有宗教学理论比较研究、中国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西方宗教与当代世界研究、宗教信仰与民俗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与社会问题研究等五个方向；考虑到基地的学术力量和国家需要等实际情况，拟定以四大课题为主要研究内容：一是中国宗教与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二是中国道教思想发展与道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研究，三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与社会问题研究，四是中外宗教的对话与交流研究。其中，中国宗教与中国社会发展研究这个课题，

主要是对中国各种宗教及其与中国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其目的不仅在于通过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宗教现象，来对有关宗教学的理论进行补充和发展，而且在于通过系统考察中国各种宗教与中国社会的相互关系，来为我们国家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中国道教思想发展与道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研究这个课题，主要着眼于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迁，其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在当今中国社会里的作用，挖掘其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与社会问题研究这个课题，主要研究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各种宗教的历史和现状及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重点在于对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现存的各种宗教进行调查研究，希望这项工作能为祖国大家庭各民族的文化建设服务，并为维护国家安定团结、促进西部大开发服务。中外宗教的对话与交流研究这个课题，目前主要是对国内外宗教研究中有代表性的优秀学术成果进行翻译，以图加强中外的学术交流并为我国宗教学学科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借鉴；与此同时，逐步开展西方宗教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和基督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对话等方面的研究，以适应人类文化全球多元性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到2009年“985工程”二期建设结束的时候，“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以良好的成效顺利通过验收，并在教育部、财政部的指导下转入“985工程”三期的建设工作。为了在二期建设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同时也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基地在三期更名为“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并设定了七个研究方向，分别是：宗教学理论与当代宗教问题、道教学与道教史、中国宗教与中国哲学、世界宗教与外国哲学、宗教与美学、道教与古代科学技术、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社会。

我们一直希望依靠创新基地的集体力量，在上述各个方面都能够取得一些重大的标志性成果；同时，也希望在创造这些成果的过程中能够锻炼出一支优秀的学术创新团队。

当然，除了二期、三期的各个研究方向以外，我们并不排斥创新基地的成员从事其他方面的研究，所以，我们又决定出版一套以基地名称命名的学术丛书。这套“丛书”，不仅将囊括以上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而且还可包括其他有关宗教、哲学研究的优秀学术著作；不仅出版本基地成员有关宗教、哲学研究的优秀学术著作，而且非常欢迎本基地以外的海内外学者向本“丛书”编委会申请，经过编委会评审通过之后，即可将其宗教、哲学研究的优秀学术著作列入本丛书出版。这样，或可在建设期内取得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更大力度地促进我国宗教学、哲学学科的发展。

总之，“985工程”的建设时间虽然是有限的，但我们的学术探索却是无止境的。我们希望，“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能够为今后的科研机构提供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其学术研究能够为宗教学学科的发展贡献一些具有标志性的成果，而其所培养的创新团队中也有一些人能够成为学术界未来的领军人物。同时，也希望这个“基地”能架起一座沟通国际的桥梁，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做出应有的贡献。

2005年11月12日书于四川大学芙蓉楼

2013年7月10日改于四川大学农林村

（作者卿希泰，现任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首席科学家）

华西协合大学与巴蜀文化研究（代序）

在中国近代史上，位居中国内陆腹地四川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为西方基督教差会在华设立的十三所教会大学之一，它是近代中国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也是 20 世纪以来中西文化互动的产物。华西协合大学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基督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组成部分，对其开展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张丽萍教授《中西合治：华西协合大学》一书，是她集多年辛勤研究的又一成果，在付梓之前，她要我写一篇序言，我对教会学校史和教会学校中国化（学界又称本土化）素乏研究，不能承担此任，只就联想到的一个相关问题谈谈粗浅认识。

私立华西协合大学（简称华大），从 1910 年 3 月 11 日建立到 1951 年 10 月 6 日人民政府接办并命名为“华西大学”的 41 年间，在由外国教会大学转变为中国本土大学的历史过程中，为四川乃至中国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显著成绩，特别是在医药学方面闻名中外；相对而言，人们对它在巴蜀文化（含蜀学）发展及其研究中的突出贡献，却了解不多，学界也缺乏集中系统的梳理。

在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巴蜀文化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重

要地域文化之一。自1941年出现“巴蜀文化”的学术命名以来^①，七十多年里，巴蜀文化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其中有关蜀学的研究又在近三十多年里蓬勃兴起。学界对“巴蜀文化”的界定，有狭义、广义二说，前者认为是指先秦时期巴蜀地区的文化，后者认为是指自古及今巴蜀地区的文化，笔者认为：“巴蜀文化，是指巴蜀地区即主要在今四川省、重庆市境内，自古至今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发展的具有巴蜀地区特色的地域文化。”^②巴蜀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华大对巴蜀文化的发展和研究，也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限于笔者的学识，本文只就华西协合大学时期该校对巴蜀文化中人文社会科学主要是巴蜀文化研究的贡献做些初步探究。

一、充实文理两科，融入华西社会

同全国一样，晚清时期巴蜀近代高等教育开始发展，其模式大体有二：一是改革教育制度。如对已有省级书院锦江书院（1704年建立）、尊经书院（1875年建立）改制的同时，参照西方学制建立学堂，如1892年官办重庆洋务学堂、1896年成都官办四川中西学堂、1902年官办四川省大学堂（同年改建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1906年

① 一般认为“巴蜀文化”的学术命名，始于20世纪40年代出刊的《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第3卷第4期、第7期）及该刊所载卫聚贤《巴蜀文化》一文，此说有一定道理，但还需辨析。

② 胡昭曦：《西部大开发与巴蜀文化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5期；胡昭曦：《巴蜀历史文化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版。参见林向：《巴蜀文化辨证——林向考古文物选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重庆官办川东师范学堂，其轨迹是由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化教育发展。二是外国人办学校。全为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其轨迹是逐渐中国化，由洋学校向中国本土学校发展，华大即为这类学校。华大初创时，“整套规划和建设方案，全部是从英美搬进来的”，“其办学宗旨是‘借助教育为手段以促进基督事业’”^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40年中，该校经历了自西徂东—采中补洋—抑洋立中——炉合冶的中国化过程^②。

华大的发展经过三个阶段，即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洋学校（1910—1933）、经由中国政府注册立案的私立学校（1933—1950）、由人民政府接办成为中国的公立大学（1951年开始）；有过三任校长，他们是毕启（Joseph Beech，美国人，1867—1954。1913—1930年任校长，1930—1946年任教务长）、张凌高（重庆璧山人，1890—1955年。1927年后任副校长、代理校长，1933—1946年任校长）、方叔轩（四川成都人，1883—1982。1946—1951年在任。曾长期担任华大教务长，任校长后承继了张凌高的办学思想和风格）。毕启是奠基人。首任华人校长张凌高于1933年9月23日完成了华大向中国政府立案，逐渐实现了华大校院级领导的改组和专业设置的重大变化。他和方叔轩担任校长期间，是华大教学、科研和医药事业明显扩充、提高和发展的时期，也是华大对巴蜀文化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时期，这是华大迅速发展提高和加快中国化的要求，是张、方二校长的办学思想的实施。

① 《四川大学史稿》第四卷《华西协合大学1910—1949》（简称《川大史稿·华大卷》），第1、11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本文有关华西协合大学的资料，大多据此书，除必要处，不一一注出。

② 参见张丽萍：《从“五洋学堂”到中国的“永久大学”——华西协合大学本土化过程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华大创办的初衷是为基督化中国服务的。起初华大的发展较为缓慢。张凌高认为教会大学不能与社会需求脱节，制定了充实文、理两科，加强调整医、牙科，文理渗透，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办学方针，使它面向社会办学，最大限度地融入到华西当地的社会生活中，融入到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在教学内容上强调实用性和为四川乃至中国社会建设服务，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推动了学校的发展，基本完成了中国化进程，使华大逐渐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一所中国的私立的综合性大学。

华大向中国政府立案前后办学思想的变化及其实施，不仅使已成为华大优势的医科更加发展，而且也使华大的文科迅速壮大并显出特色，特别是“融入华西社会”的要求，更使华大的教学科研着重面向巴蜀地区的历史与文化，为巴蜀地区的社会服务，从而也必然关注对巴蜀文化的研究。

二、大批名家云集，推进巴蜀研究

在张凌高担任校长后，华大的文科教学科研实力有了很大增强，学校聘请中国籍教师的人数明显增多，其中不少是研究巴蜀文化的著名学者，他们对华大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和巴蜀文化研究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华大的教学科研队伍，大体由几部分组成^①。

一是外国人。其在教师中比例逐渐减少，中、西籍教师之比例：

^① 有关教师人数及其中西比例，见张丽萍：《从中籍教职员的变迁看基督教大学本土化进程——以华西协合大学为中心的考察》（未刊稿）。

开学第一年（1910）为 2 : 8，1917 年为 1 : 23，1931 年为 62 : 60。西籍文科教师中不乏名师名家，如戴谦和（Deniel Sheets Dye，理学院院长，大学古物博物馆奠基人，主持校博物部长达 20 年）、葛维汉（Darid C. Graham，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古物博物馆馆长）、费尔朴（Dryden L. Phelps，哲学博士）、文幼章（Jame G. Endicott）^①等。

二是中国人。华大聘请的中籍教师，初期聘数少、聘期短，但均为名家宿儒，如廖季平、刘豫波等。1928—1947 年，受聘来校的著名学者更多。抗战时期，内迁几所大学在成都华西坝联合办学，国内名家荟萃，华大聘请的文科著名学者数量明显大增。

三是国外著名学者来校进行学术访问或讲座。如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②等英国以及法国、波兰的来访学者。

在中籍教师中，不少是四川籍^③名家或蜀学传人。如廖平（清进士，著名经学家）、刘复礼（清进士）、文龙（清翰林）、刘豫波（蜀中儒学槐轩学派创立人刘沅之孙、文学家）、林山腴（举人，文学家）、龚道耕（清举人，经史学家）、赵少咸（语言文字学家）、刘绍禹（心理学、教育学家）、张凌高（教育学家）、吴君毅（法学家）、钟稚珩（语言文学家）、庞石帚（文学家）、杜奉符（文学家）、罗玉君（文学翻译家）、蒙文通（史学家、经学家）、何鲁之（历史学家）、罗忠恕（哲学家、心理学家）、蒙思明（历史学家）、罗荣宗（社会学

① 文幼章（1899—1993），加拿大人。1899 年生于四川乐山。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1925 年在华西协合大学及华西协中任教，曾任大学英语和伦理学教授。

② 李约瑟，英国人，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等。

③ 本文所谓四川是指当时的四川省，包括直辖后的重庆市地区。有的地方必要时，则注出今日重庆。

家)、程英祺(经济学家)、傅葆琛(教育学家)、方叔轩(教育学家)、伍非白(中国哲学史家)、任乃强(藏学家、历史地理学家)、程芝轩(文学家)、祝杞怀(历史学家)、李培甫(文学家)、姜蕴刚(社会学家)、甄尚灵(语言学家)、林名均(考古学家)。

非川籍学者大多是名著全国的,不少是一流的,如顾颉刚、钱穆、容庚、冯友兰、吕叔湘、徐中舒、陆志韦、赵人隼、陈寅恪、韩儒林、吴宓、萧公权、李方桂、刘咸、冯汉骥、缪钺、闻宥、朱少滨、郑德坤、张东荪、谢霖甫、许寿裳、刘朝阳、常燕生、孙伏园、董作宾、郎毓秀、蒋旨昂、黄方刚、沈嗣庄等。他们除了从事本专业研究,不少学者也积极进行巴蜀历史文化研究。

华大文科教师的构成,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和特色,即中西合作和校内外合作,贯穿了整个华大时期。

中西合作,例如,林名均与葛维汉,自葛维汉 1932 年任华大博物馆馆长、20 世纪 30 年代林名均到华大博物馆工作,二人开始学术、工作上的合作交流,一直持续到 1948 年葛氏退休回国。双方合作的重大活动包括 1934 年广汉三星堆首次考古发掘、1933—1936 年成都东门外琉璃厂窑址考察^①。又如,罗忠恕任教华大哲学系,1934 年任文学院院长,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到华大任教或讲学,并于 1939 年提议在英国牛津大学成立了中英两国大学文化合作委员会,之后又组织一些中外学者在华大建立了“东西文化学社”(罗被选任社长),开展讲学和科研活动^②。

对于巴蜀文化研究而言,更重要是校内外大范围的学术合作。在

① 参见周蜀蓉:《中西学术互动之典范——以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葛维汉与林名均为例》(未刊稿)。

② 罗义蕴、罗耀真:《掬水移月:西出蜀道有知音》,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5—23、87—88 页。

成都，华大与具有文科突出优势的国立四川大学（简称川大）毗邻，两校间许多教学科研活动联系密切频繁而长期。抗战时期会聚华西坝的高校有华大（东道主）、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人们习惯称这一时期为抗战“五大学联合时期”^①，“友校并立，教授课程，交互合作，人才相当集中”。加上有的学者兼任四川省、西康省一些学术或行政机构负责人，出现了教师队伍的大量校际兼任和有关政府机构配合支持的局面。例如，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1943年夏—1945年秋，任教成都燕京大学，同时受聘于华大中国文化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语言学家吕叔湘，1940年在华大任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42—1946年任成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家钱穆，1939年在成都齐鲁大学任教并主持国学研究所兼任华大课程，1943—1945年任教华大并兼教川大。历史学家顾颉刚，1939年—1940年上半年任教齐鲁大学并兼任该校国学研究所主任，1944年11月再次任教齐大。历史学家徐中舒，1938年2月任川大历史系教授，1943年9月至1944年上学期，兼华大文学院历史系教授，1946年任川大史地系系主任，1950—1951年兼华大教授，1952年任西南博物院院长^②。历史学家、蒙古学家韩儒林，1940—1943年任华大历史系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③。历史学家、经学家蒙文通，1938—1940年任教川大历史系，1941年任教金陵大学、兼任四川省图书馆

① 华西坝五大学，1942年秋以前指金大、金女大、齐大、中大、华大。1941年中大自办医院，而1942年秋，燕大在成都复校，故1942年后五大学指华大、金大、金女大、齐大、燕大五校。

② 徐亮工：《徐中舒先生生平编年》（未定稿），载《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版。

③ 邱树森：《韩儒林传略》，《文献》1990年第1期。

馆长，1942年下半年兼教华大，1943—1948年4月任职省图书馆，兼教华大、川大，1949年在华大、川大任教，1950年在华大，上半年兼哲学系代主任^①。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冯汉骥，1937年受聘四川大学任史学系教授，1941年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1943年兼任华大社会学系教授，1944年代理华大社会学系系主任^②。文学家、历史学家缪钺，1946年应聘为华大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兼中文系教授，1947年8月兼川大历史系专任教授，1948—1951年任华大、川大教授^③。考古学家郑德坤，1936年在华大任教，1941—1946年任华大博物馆馆长。语言学家闻宥，1937年任教川大中文系，1940—1951年在华大文学院任教中文系兼研究所所长并兼教川大，1951年在华大文学院任教兼博物馆馆长。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李安宅，1938年赴甘肃拉卜楞寺对藏传佛教进行实地调查，后任教于华大。于式玉，民族学家，1942年与丈夫李安宅先后赴成都后，在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任教授。藏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1940年任西康省通志馆筹备主任，1943—1945年在华大任教兼华西医边疆研究所研究员，曾率华大考察团赴康藏地区考察^④。哲学家伍非百，曾任华西大学教授、四川省图书馆馆长等^⑤。历史学家赵卫邦，1940年在北平辅仁大学研究院史学部任教，被派深入西康省凉山地区从事少

① 蒙默：《蒙文通先生年谱》，载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版。

② 林向：《西南考古学的奠基人——冯汉骥教授》，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3期；《童心求真集——林向考古文物选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1—415页。

③ 缪元朗：《缪钺先生生平编年》（1904—1978），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版。

④ 《川大史学·任乃强卷》“前言”，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⑤ “四川省文史馆网·历任馆员”。